

主编
麦永雄

东方文化／东方美学／东方文论／东方文学／比较诗学／比较文学

東方叢刊

2007. 2

- 中华美学学会
-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 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
-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联合主办

东方丛刊

李嘉林題

Dongfang Congkan

主编/麦永雄

中华美学学会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联合主办

2007年第2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丛刊. 2007 年. 第 2 辑 / 麦永雄主编. —桂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633-6610-1

I . 东… II . 麦… III . 文学研究—中国—丛刊
IV . I2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156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金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8.125 字数：190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1 000 册 定价：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东方丛刊》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问 季羨林 贺祥麟

特约编委 丁帆 王杰

叶朗 乐黛云

刘纲纪 刘中树

朱立元 吴元迈

饶芃子 郭齐勇

钱中文 黄宝生

童庆炳 曹顺庆

董晓萍 曾繁仁

编委 王德明 孙建元

麦永雄 张明非

张利群 肖启明

何林夏 胡大雷

莫其逊 黄伟林

覃德清 雷锐

目 录

文学观念与文体文风变迁

李剑锋	走出传统文学史写作的困境	(1)
张树国	图腾记忆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	(11)
王纯菲	女贞与女色 ——中国古代文学两极女性形象并存的民族文化缘由	(28)
周苇风	论汉人的辞赋观念	(41)
林大志	论唐代苏、张变革文风之功绩	(52)
张震英	论贾岛诗歌之“奇僻”及其在诗歌美学史中的意义	(67)
黄 键	不对称的双重时间 ——元代道教度脱剧的时空体形式	(81)
朱丽霞	《壬申文选》与《昭明文选》 ——从二者之比较看明季云间派的骈文创作及其 文学史影响	(97)
张开焱	“入于文心”与“谐于里耳” ——冯梦龙小说思想研究之二	(111)
莫山洪	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看清代中叶的骈文文体观念 ...	(125)

- 贺根民 艰难跋涉：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 (138)
汤凌云 新月诗派的诗歌接受论 (150)

比较视野与东方文学

- 杨中举 跨界流散写作：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 (164)
尹锡南 《诗学》与《舞论》的两组关键词比较 (177)
杨 建 东方文学学科的东方学渊源初探 (186)

东方讲坛

- 刘跃进 期待中的焦虑
——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201)
洪子诚 诗歌的边缘化 (219)

东方文库

- 马奔腾 神田喜一郎致王国维信 (234)
蒋 劳 “创新”与“发展”：学者的永远追求
——从《翻译文学导论》说起 (244)
李 丹 对话：本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汇流
——《湖南 20 世纪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与
超越》简评 (250)

走出传统文学史写作的困境

◎ 李剑锋

在回顾与总结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历史时，戴燕曾经说过一段引人深思的话：

还原文学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正是本世纪大多数文学史家的信念和心愿，人们不仅相信有过一个实存的文学历史，还主张通过精心的“考古”手段，用文学史的形式将它客观地再现出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中国文学史的叙述者们渐渐酝酿出了他们理想的叙事方式，他们不断地用历史来解释文学的存在，用历史学的观念、方法、技巧来圆满编织和随时丰富文学史的传奇故事，因此，如果说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模式是靠着历史学的滋养形成的，是历史主义的一个神话，也许并不算夸张。^①

这的确道出了一个事实：“还原文学历史的真实面貌”是“历史主义的一个神话”，更确切地说，这是传统真理观的产物，是传统的把历史之真归结为纯粹的客观存在的观念的产物。任何历史，从其历代

的不同解读来看,都是当代史,文学史也不例外,它是编写者带着自己的视野所能够看到并梳理出的文学史,没有不存在编写者主观见解的纯粹的客观文学史,任何还原历史真相的做法只是主观努力。在此并不是否定这种努力的意义,否定文学史写作中史料考订的基础作用,而是在说明传统的写实的文学观正面临着被指责为“神话”的困境。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而且,伴随着西方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兴起和深入影响,也越来越多为人们或多或少的赞同。作为文学史的研究者和编写者,不应当满足于对“神话”指责的反驳,而应当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实事求是地检讨原来传统文学史写作的局限,认真探讨新的学术思路和文学史写作的方式,以避免传统的局限,走出困境,开拓属于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学史。

当我们力图去反映文学史的真实时,解释学的真理观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根据解释学的观点,任何理解都是局限在历史传统中的理解,主体对客体的理解不是主体对客体的静止考察,而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话”,是对话中形成的视野融合。客体以其历史的存在方式制约着主体的理解,而在“对话”之前,理解的主体也已经有一个“先见”或视野,主体只能带着先见去与客体对话。任何理解都是既有视野制约之下的理解,是相对的。因此,传统的真理观就应当修正。“传统的认识论将真理看作以命题形式出现的判断与对象的符合。这种以求知为目的的真理观在认识领域有其合法性,但推到极点,那种以认识对象为唯一标准,作为实践的工具(方法)的真理,则可能与人的存在隔膜,甚至成为一种与人怎样立身处世这一生命意义无关的真理,使真理丧失了本体论的意义。”^②解释学抛弃了传统的真理观,认为真理是存在的敞亮,是自身展露并同时揭示他者的澄清过程。因此,对精神科学中真理的揭示就不是客观对象一极所决定的,而应当正视和重视人与物的历史性,一定不能离开承认其制约性的传统进行思考,“传统的要素总在起作用”^③。任何

真理都是在前理解制约下的过去与现在的视野融合。这看似强调了真理的相对性,而实质上是更为实事求是的真理观,它破除了专断论哲学中绝对真理的神话,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和实践制约下发展的真理观是契合的。真理都是视野交融中的真理。因此,寻找文本的“真实”意义就是一种错误的思路,如果把作者赋予文本的意义称为原始意义或者“真实意义”,那么它也仅是前视野制约下的作者与文本所表现的同样受前视野所制约的对象之间的融合,这种意义仅仅是文本成为具有阅读价值的作品的开始,而不是终结。文本的作品价值是在后代读者与文本以及他前代读者的视野交融中逐步展现的,也就是说文本没有一成不变的“真实意义”等着人去发现出来。文本不是盛着苹果的篮子,等着你去拿,拿完以后,篮子里就没有了;文本是一棵苹果树,苹果是文本的意义,不同的人会摘到不同的苹果,即使一个人把苹果全摘下来了,那么明年所摘到的苹果与今年所摘到的仍然不一样,虽然苹果都是苹果树所生的。从对话的角度讲,文本也是一个受传统制约的特殊说话主体,它有自己的视野和生命,但它存在的意义和它自身的本性还需要对话的另一方不断地来激发和确证。否则文本的意义对于读者就像成熟了却没有摘到、任其从树上落下烂掉的苹果,毫无意义。苹果树上的苹果年年生,年年的味道在类似中又有差异;文本的意义也在年年产生,这些意义有视野交融中的相似性,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在视野融合中不断变换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才是文本的“真实意义”。

传统的追求文学史真实的写作方式教给我们的学生的主要是一种静止的思考方法,它是传统专断论哲学背景下的思维残留,而不是变化论哲学时代富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特点的思维方式的礼物。近代以前的哲学,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主要是独断论的哲学,即认为世界的决定力量是给定的,不论是精神的上帝、绝对理念,还是物质的气、原子,都是“一”的衍化和派生。这种哲学影响之

下的话语是等级社会制约下的权力话语,认为凡是与“一”相合的都是“真实”的,或者说,等级社会中的哲学在追求虽然是虚构却被设定为真理的“一”。其积极意义是在文明的旗帜下把世界变得有条不紊,变成“一”支配下的秩序世界。强调万有的统一性没有错误,但不能因此忽视了万有的差异性。因为终极的“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独断论的哲学时代已经结束了,“人们已抛弃了这样的标准:一个人可以从所谓自明的第一原理着手推演,并靠着纯粹的反思达到一种世界图景,它具有独立不依的合法权力”^④。真正具有“合法权力”的不是绝对的“第一原理”(终极真理),不是永恒,而是“相对”和变化,只有变化才是绝对的。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时间史之谜》中认为静态的宇宙是不存在的,宇宙处于永恒的变化中,宇宙在膨胀和收缩之间循环往复,旧宇宙的终止意味着新宇宙的开始。现在的宇宙在时间上有一个开端,这就是宇宙创生时大爆炸的奇点;时间在宇宙的开端遭受剧烈的改变,时间概念在宇宙开始之前没有任何意义。宇宙空间在不断的膨胀,星体离我们越来越远。“有理智的人只能存在于膨胀阶段。”^⑤看来,属于人类目前的生存时间和空间不是永恒和无限的。随着人类视野的开拓,另一个有生命的“地球”将可能被发现。人类永恒、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也越来越失去依据。如果回忆一下过去人们对宇宙和人类的看法,不难发现这些崭新的观念本身就是真理相对性的绝好证明和启示。宇宙、时间这些被传统观念认为是永恒不变的东西也已经被量子宇宙学证明是变化发展的。它们在人类的视野中呈现出迥异于传统的意义。世界是变化的,现在只是变化中的相对静止,历史也是变化着的相对静止,文学史也不例外,在变化中生成也是文学史的本质特性。因此,试图通过文学史去告诉读者一段静止的真实历史的做法就不明智,不利于解释文学史的真正面貌,也不利于读者从变化的角度作创造性的思维。

“天地之大德曰生”^①，“生生之谓易”^②，在变化中创造是大自然的本质特性，重视变化就是重视人的创造力，为新的文学意义的产生奠定发散性思维的心态。而从重视读者的视角来编写文学史可以突出文学史的变化性。解释学文论和接受美学为我们从读者视角看待文学史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它们突出了读者在文学系统中的地位，认为作家、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其内涵不是生成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历史的一个能动构成”^③，它的含义、价值、地位是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活动中不断地被揭示、充实和丰富起来的。作家是作品的生身父母，而读者才是作品永远的养育者。传统的文学史编撰格外关注作者、作品与世界，认为“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是最真实最牢靠的，因此他对文学的解释，所着眼的主要就是这一层关系，当他试图阐释一部作品的意义并对其评估的时候，往往都要从作者身上去求最终的正确答案，由作者的写作动机到引发动机的心理，由隐秘的心理到养成他的身世处境，由个别作者的身世处境到造成它的总体环境……”^④在“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的文学四维关系中把读者的一维忽视了。至多是引用或赞同个别读者的“真知灼见”以佐证编撰者的观点。作为文学构成维度之一的读者最足以体现文学作品的变化性，从历史的眼光看，他们至少与作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如果从作品意义的生成和存在价值来看，读者的地位远远超越了作者。作为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者，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胸怀把读者的智力融入进来，才能够更好地开发当代读者创造作品意义的热情和心智。

历史的本真处于迷雾之中，何况“本真”发生时，当事人眼中的“本真”就已经有了主观色彩，愈到后来，“本真”欲是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种视角中存在着。因此，要还原文学史的真实面貌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寻找纯粹客

观真实的传统思维方式应该变一变了,我们仍然可以“还原文学历史的真实面貌”,但不是到筐子里去拿苹果,而是到树上摘,不但要尽量把今年的苹果摘完,而且要把历年苹果考察一番。也就是说,文学史的编写者要超越纯粹客观的立场,承认自己的历史局限性。看一看既有的文学史,几乎没有一种不是力图教给我们可靠的真实,然而没有一种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可靠真实。我们并不能避免从自己的视野出发去考察文学史,但不能因此把自己看到的当作纯粹的真实,而应当重视过去读者对作品的解读成果,把固定不变的真实转变生成长变化着的历时真实。

那么,文学史具体应该怎么写?仁智之见与躬行之作,近年来不断面世。但多数仍然走着传统思维的路子,在实践着“还原文学历史的真实面貌”的神话。所不同的只是变换了对文学的观照视角,由把文学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转换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是人性和灵魂的写照等,这种视角的转换使新的文学史关注到以往文学史所忽视的文学本质,发现了许多传统文学观所看不到的盲点,自有其存在的当代意义。但写作的思路仍然是用编写者个人的视野笼罩整个文学史,个人视野之外的“非本质”的文学史被取舍掉了。在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的思维关系中^⑩,更多地关注了前三者,而忽视了读者。或者说,读者被单一化为编撰者。即使是在充分吸收当代研究成果的文学史里,虽然缺乏主编个人贯穿始终的文学本质观,更多的是众多参编者视野中的段落文学史,但也是作为有限读者的当代编者视野制约下“文学真实”的汇合。文学史所要叙写的仍然是“我看到的真实历史”,是“我要把这些真实的文学史”作为“科学”的知识在课堂上传授给听课的学子。只要抱了单纯求真的意图,不论换什么样的撰写者,其中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也大多是换汤不换药的传统文学史。由此,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仍然没有走出从“我”的视野出发追求历史真实的神话。也许,由于“先见”

的存在,我们永远走不出这种神话,但我们至少应该走出“这就是真实的文学史”的机械的静止的传统观念,而传达给文学史的读者这样的观念:“我所阅读的只是编撰者所看到的文学史,而这个文学史不是最后的历史实在,它虽然接近了某些历史的真实,但永远不是千古不变的真实本身。真实仿佛是一个地平线,看看它近了,它实质上仍然在远方。即使有我们共同认可的当代真实,这些真实的面目在未来肯定会不同。”这是一种变化着的富有容纳精神的开放思维。

我们今天如何走出传统“权力”文学史的困境呢?换一种问法就是:我们如何寻找视野交融中的文学史,如何寻找更多读者(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视野中的民主化的文学史?我们的回答是:充分重视读者在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的地位,写一部变化着的文学史。

既然读者是以往文学史所忽视的,而且又与变化的开放观念始终相连,那么,应当如何突出读者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作用呢?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重视古代文学接受史的研究,在细致深入的接受史研究的基础之上,于文学史的编写中凸显读者的重要作用,并在对读者接受史的梳理中贯穿变化的观念和视野交融的观念,由此可以写一本开放的变化着的文学史。

首先来看古代文学接受史的研究。按照读者的身份来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读者身份的作品之作者的研究;一类是作品产生以后,阅读作品的读者的研究。

关于第一类研究,也就是把作者看作读者的研究。作者创作的作品不是凭空产生的,他在创作之前已经有一个前视野,重视这个视野也就是重视作品的渊源。“从历史的取向来说,接受理论也是研究‘关系’,而不是研究‘起源’……‘接受史’肯定不是‘起源史’。”^⑩我们现在扩大读者的含义,把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也纳入“读者”,把影响作者创作的、作者所能够看到的传统设定为他的阅读对

象,相对于这些对象,作者也就转变为读者,针对作为读者的作者研究就是“起源”研究,“渊源”研究。^②

关于第二类,针对阅读作品的读者的研究,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接受史研究。我们认为:“一部作品的接受史便是一部后代读者对作品及前代读者的接受成果的继承发展史、扬弃创造史,是凝定与新变、积淀与突破辩证结合的历史。考察一部作品的接受史,最应注意描绘的是积淀性成果形成的轨迹和突破性成果产生的历程,以及它们形成、产生的原因。这便同只着眼于作者在历史上的声誉、影响,而忽视历史环境和阅读中的变化的历史研究方法区别开来。”^③之所以要重视描绘“积淀性成果形成的轨迹和突破性成果产生的历程”,就是希望展示作品意义的去蔽显明的发展变化,使文学史融入众多读者的声音,给予文学史的读者以新思维的启迪。比如对陶渊明作品地位升降的深切描述,对其《闲情赋》指责与肯定观点流变的描述,对陶渊明思想归属儒、道、佛争论历史的描述等,比静止的论述陶渊明作品的崇高地位、《闲情赋》到底说了个什么意思、陶渊明的思想应该归属某家,教给文学史读者的会更多。至少,让读者明白了“文学史的真实”:初始的文坛不是传统文学史梳理出的样子,作品的意义、地位是变化着的,是不断生成和正在生成的,作为读者的自己也可以参与作品意义的创造性建构。而对变化着的文学史本身的描述又为文学史的读者搭建了登高望远的平台,拓宽了他的视野,为他进一步融合自己与作品的视野,提出融合过去又富于当代意义的新见打下了基础。贯穿于文学史中的变化观念也在无形中浸润着文学史读者的心灵,为他带来了主动创造的心理态势。或者说,变化着的文学史解放了读者的心灵,使读者从传统的追求文学史“原貌”、获取纯粹客观的知识的思维中走出来,激发起读者参与解读作品与创造意义的热情。那种把答案说死,不给读者留下思考空间的做法很可能就堵塞了读者(尤其是学生)发散性

的思维路向，遏制了他们的创造力。

然而编撰这种充分吸收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成果的文学史，目前时机尚不够成熟。原因很简单，古代文学学科内的接受史研究才开始不久，连一些大作家的接受史都没有研究充分，遑论一般作家和作家流派，作品渊源研究也几乎没有多加关注。但是，在有了接受史研究的个别作家的编写上，我们完全可以先作尝试，以此开启变化着的文学史的先河。重视读者，并非完全以读者为本位，而是把传统文学史忽视的文学维度凸显出来，对于读者之外的作品、作者和世界也给予应有的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一本既重视作品、作者、世界，又重视读者的变化着的文学史可以使我们迈出传统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为文学史的写作开辟一条崭新的开放道路。它的撰写既可以充分吸纳传统文学史的优长，充分重视可靠的原始资料，描绘文本与作者视野交融中作品意义，也可以扩大史料的搜集视野，使史料由作者的时代向前追溯到作者作为读者所看到的前代史料，向后延伸到文学史读者所在的时代，描绘作品意义形成和明晰的历程；既可以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又可以把这种真实性放在变化着的读者之流中加以审视，避免静止和机械的误区，使其变化性从根本上与宇宙的绝对变化性统一起来。我们这样做，不是不要静止，而是把静止相对化，具体地说就是把静止的“真实”更多地让读者来承担，使静止的真实体现在多数读者认同的积淀性成果上，不要完全压给作者和文学史的编撰者。这样一部变化着的文学史是一部开放的文学史，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历代读者都可以参与建构文学史，文学史因此就是广大读者的文学史，是一部真正民主化的文学史。

当然，变化着的文学史所展现的文学变化历程也决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因为编撰者总有自己的前视野。文学史的编撰者也应当发表自己对文学的见解。但他的前视野所看到的，只是他所编写的

文学史中的一种声音,他留给历代读者多种声音的存在空间,也留给当代读者更多的说话余地。除了把那些视野融合中的创见写出来,他甚至可以有选择地把那些奇谈怪论也提出来讨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⑩,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启示我们摆脱自我中心,以容纳万物的开放胸怀对待其他物种,对待世间万物,这样才能有利于人类自己的健康发展。变化着的文学史的编撰者对待读者也应当有此胸怀,唯有如此,才有利于文学健康的发展,有利于主体潜能创造性的发掘。

-
- ①⑨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49、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② 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207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 ③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363页,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④ [英]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2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⑤ [英]霍金:《时间史之谜》,182页,张星岩、刘建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又译为《时间简史》,胡小明、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
- ⑥⑦ 《周易·系辞下》、《周易·系辞上》,参高亨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87。
- ⑧ [德]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参见《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26、24页,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⑩ 参见[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⑪ [荷兰]佛克马、易布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15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
- ⑫ 详参拙著《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绪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 ⑬ 详参拙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绪论”,济南:齐鲁书社,2002。
- ⑭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齐物论》,北京:中华书局,1983。

李剑锋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教授 文学博士 邮编:250100

图腾记忆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

◎ 张树国

图腾(totem)一词来源于北美五大湖地区阿尔袞琴人的说法，“ototeman”意为“他是我的一个亲戚”，“亲戚”指命名某一氏族的动物物种。^①严复 1903 年翻译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时首次将“totem”一词译成“图腾”。关于图腾定义及其制度，在西方存在着很大争议，早在 1910 年甘奈普(Van Gennep)在《图腾问题的现状》中就整理出 41 种不同的图腾制度的理论。摩尔根《古代社会》、洛维《原始社会》、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认为图腾是氏族的标志或族徽，将图腾崇拜视为初生氏族的宗教；弗雷泽《图腾制与外婚制》认为图腾崇拜与外婚制的氏族结构相一致，图腾既是亲属，又是祖先；朗格认为图腾是个人保护神，崇拜者在一定程度上与图腾合并为一，或者用象征手法表示与图腾同化等。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图腾制度是建立在人类与动植物之间的同一性的心理基础之上，图腾是对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群体的称谓，这种称谓既有可能求助于动植物，也可能有许多其他方式。图腾制度应该被定义为动物物种与人类氏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关联到艺术与巫术、社会与宗教问题。^②可